汉唐文化史

熊铁基 著

湖南出版社

汉唐文化史

熊铁基 著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汉唐文化史

熊铁基 著

责任编辑:李雄伟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97,000 印数:1—3,200

ISBN7—5438—0410—7

K·65 定价:8.40元

目　录

综论篇

第一章　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轨迹 …… (1)

第二章　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 …… (12)

第三章　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 …… (24)

第四章　南北与中西 …… (40)

分论篇

第五章　家庭 …… (59)

第六章　经学 …… (112)

第七章　社会思潮 …… (157)

第八章　文学艺术 …… (222)

第九章　风俗习惯 …… (296)

附录　关于汉唐文化史的资料 …… (379)

后记 …… (389)

综论篇

第 一 章

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轨迹

文化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几个大方面是可以肯定的，它们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有机整体的运动、发展历程就是文化史。本书讲的文化史，主要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本章将综合描述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共同发展的轨迹。

连续性中的波浪式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如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绵延不断，发展的连续性是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很容易看到它在发展中高峰迭起，高潮起伏。当然有高潮也就有低潮，因而就呈现为波浪式的发展。问题是：何时是文化发展的高潮？是怎样的高潮？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有些历史学家、文学家歌颂汉唐盛世，包括认为这些时期的文化繁荣发展，相对而言，魏晋南北期、宋辽夏金时期就是“乱世”，也包括说它们文化的衰败；有些哲学家的看法则不一样，认为汉唐在文化思想方面只有因袭，没有创造，倒是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有创造性的发展。这两种似乎对立的看法，事实上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到底何时是文化发展的高潮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汉、唐、明这几个政治上统一强盛的朝代，特别是它们的初期，随着政治上的相对安定、向上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文化心理，是积极的、进取的，充满信心，相信自己的力量，豪迈、外向、热情、欢快……等等。不但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是如此，一般人民由于身家性命的基本安全，所谓"民则家给人足"（当然只是基本、相对的，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相比而言），也有一定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上述状况当然是影响而且有利于文化发展的。

例如文学，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是文化的代表。汉赋、唐诗就可以反映上述汉唐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说汉赋是歌功颂德也是不错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当时也确实有功可歌，有德可颂。更重要的是："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①]"，表现了博大、雄伟的气派，欢快、进取的精神。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可以作为代表，就是歌颂了大一统王朝宏大的气魄和声威。虽然铺张过分，却反映了"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②] 作家的这种心，实际上又是现实的反映，是汉朝空前统一、繁荣的现实，加强了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信心，从而也开拓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和胸襟。唐代文学光芒万丈，其中诗歌更是高度成熟，盛唐时期的诗风，充满蓬勃向上的精神，浪漫主义成为主流，与唐前期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当然以上所说只是文学反映时代的一方面，另方面则是针对社会政治的黑暗、残暴、荒淫、腐朽进行揭露、控诉和批判。两方面归结起来都说明，一定时期的文学象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一定时期的政治面貌，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人们的思想感情（包括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乃至劳动人民的）。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

① 《文心雕龙·诠赋篇》。
② 《西京杂记》，卷2。

事而作。"① 所谓时和事，就是当时的政治。也就是说，文学主要是反映政治的，受政治的影响甚至直接干预的，直接或间接为政治服务的，象汉、唐这样强大的统一王朝，这一特点十分明显。

那么文化的其它形态（思想、学术、宗教、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是否也和文学一样，在汉、唐等几个统一王朝时期也有上述特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无法详细列举，但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一是政治上的直接干预，对于各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施行一系列的政策，采取许多不同形式的措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二是强有力的政治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自然影响文化创造者的个体心理，从而也在各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中表现出来；三是可以从各种门类文化发展的主要面貌和精神看到政治的影响。

据上所述，我认为，汉、唐、明等几个强大的统一的王朝，是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一个一个的高潮，可以称为政治文化的高潮。而几个高潮之间自然是相应的低潮，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辽夏金时期，只有不同于上述政治文化高潮来看，才可以说这两个时期处于低潮，否则与事实矛盾。

首先，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时期的文化决不是没有发展，从某些方面看甚至也可以说是高度发展。其次，这两个时期的文化也决不是和政治毫无关系。不过，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着力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因而政治对于文化的直接干预相对要少很多，有时甚至可以说完全无暇顾及，同时，干预的力量、范围（文化诸范围和地区范围）相对也要少很多。政治在各种门类文化中的直接反映也微弱得多。从为政治服务来说，恐怕是间接又间接了。魏晋玄学中有政治思想，是要经过许多分析的，它怎样

① 《白氏长庆集》，卷 28，《与元九书》。

为政治服务更加抽象，只能联系时代指出“无为”或者“名教与自然”的“政治意义”（如汤用彤先生所曾作过的）。宋代的理学，几乎被一致认为是官方哲学了，但它被统治阶级利用和它本身的发展并不能等同，从它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看，很难说受政治的直接影响，它的政治意义也要联系其它情况才分析得出来。

那么，这两个时期在文化上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呢？在政治对于文化的直接干预和影响相对减弱的时候，创造文化的人的个性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这与许多玄学家卷入政治仇杀斗争、“名士少有全者”并不矛盾）。颠沛流离于战乱之中，或者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时代，人们没有热情奔放，却有冷静细密的思考，在不平静中寻求平静，在苦难中寻求欢乐，在前途渺茫中寻找前途，甚至寄希望于来世。冷静思考，探索自然，分析社会，研讨人生，这一切都引起文化的变化。魏晋玄学被称为一次思想解放。两宋理学中思辨哲学更为精致，而且充分注重精神生活，肯定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力求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当然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哲学家们可以完全正确地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高潮时期。而且不限于哲学，在这样的哲学指导下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其他的文化门类中。总的特点是，人们追求个性的精神上的丰富，力图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完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时期，是哲学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

这样，政治文化的高潮和哲学文化的高潮交替出现，甚至大波浪中还有许多小波纹，它们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交融，形成了一股十分壮观的文化潮流。在世界历史上，唯有中国古代文化可以称为真正的绵延不断，在群峰争胜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低潮，中国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古代文化传统“中断”的现象，因而也可以说没有也不需要来一次明显地“文艺复兴”。

事物的发展本来是很复杂的，任何概括都只能是就某方面或

者主要方面而言。说高潮、低潮，说波浪式发展，用描图的方式表示出来，决不是一个规则的波纹，而是和心电图所示的那样，是不同高度的高低波纹，大波中还有小波，而且要用两种以上的线条或者颜色来表示上述不同的高低潮和波浪。

统一性中的不平衡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的统一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文化的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反映，也是政治统一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的统一文化，决定着中华民族的面貌。

讲文化上的统一，首先要讲政治上的统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政治统一决定的。秦汉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之后，虽出现过几次大的公开分裂，但从发展趋势和结果看，都是统一的。这个统一，是在一块辽阔的土地上的统一，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海边，各地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差很大，决定着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政治上的统一不能违背这种自然形成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不平衡发展中的自然对流、交融，才有利于统一巩固和发展。

文化上的不平衡发展，可以从很多方面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各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含义也要从多方面理解，既包括发展水平（先进与落后、长短、多少、大小等等），也包括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不平衡性还可以从多样性方面来理解，差异也是不平衡。所有这些不同方面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地区和民族就密切相关，地区和民族与各种文化特点也有较多的联系。某些地区农业发展，某些地区畜牧业兴旺，各有所长；这种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也可以说各有所长：北方人善骑，南方人习水。"胡服骑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习惯，"断发文身"则是

南方以渔业为生者的风俗。生活在广阔的草原上，人们长于骑马、射箭，性格豪迈、奔放；生活在河湖港汊之中，人们自然善于行船、游泳，坚韧、顽强等精神从而培养形成。所有这些不同，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但是各有所长，各有用处。

以上所说涉及到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从多样性来说明这个问题，而强调说不平衡发展呢？是这样考虑的：

首先，文化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不完全一样，它表现为占统治地位，表现为影响广泛的中心，甚至可以表现为"时代精神"。但并非真正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都是一致的。不仅有程度的差别，有无的不同，甚至有完全相反的表现。最明显的例子如秦朝，政治上的统一，可以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文化上的统一就有所不同了，尽管统一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燔诗书"、"禁私学"，但在事实上不少地方私人讲学不绝，以至陈涉起义之后，"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为臣者"①，像伏生、孔鲋、浮丘伯这样一些当时的头面人物均有不少从学者。虽然"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②，仍有许多人纷纷壁藏诗书，汉初除"挟书令"、搜求遗书，事实就说明诗书并未烧尽。其他朝代的文化统一莫不如此，除了"异端"是一种表现之外，统一推行的东西也是不平衡发展的。例如，从汉代开始统一下令，郡县立学校，乡曰庠，聚曰序。如果认为真正在全国推行了，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或以后都不过京辅以及成都等少数几个地区有可能部分的实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教育则落后得很。

讲学术、思想、文化的时代特征时，有时可能使用"经学时代"、"玄学时代"这样反映统一的词语，但从当时实际的社会影响来看，

---

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玄学实际上不过是洛阳之学，它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经学的影响要大一些，单就其发展范围来看，也是逐渐扩大的，在此过程中形成许多不同地区的特点，从而产生众多的流派。西汉"独尊儒术"，确定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但从东汉开始，大的区别南北经学各有特点，更不消说有众多的师说、家说。同样，宋代理学似乎也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实际上其中派别林立。

其次，文化统一性中的不平衡发展，虽然包括着发展的先后、多少、大小等等的不同，也包括着各地区、各民族在不同时期、在风格特点方面的差异，也可认为是多样性。但是从发展二字的意义看，多样性本身不能很好说明文化统一的形成和发展，不平衡则可以反映需要和能够流动和交融。多样性是相对稳定的，差异的本身不一定互相影响，不平衡可表示不会一成不变，而会引起对流，不仅仅是落后向先进学习，先进带动落后，而且会既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也会兼采和容纳其他的特点和长处。

统一性中的不平衡发展是客观存在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些记述，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有不少启发，他写道：

>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死之具也。"

第一，他从自然、经济讲到习俗，也讲到了文化，因为所谓"谣俗"，不仅是指风俗习惯，也包括心理、性格、审美观、价值观等等，这都是观念文化的重要内容；第二，讲到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如某某地方土地如何？人民生活如何？再就是其"俗"如何？或"其俗缓急习事"，或"人民矜慓忮，好气，任侠为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或“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或“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或“其俗剽轻，易发怒”，或“清刻，矜己诺”，或“南楚好辞，巧说少信”……等等，虽不一定概括得确切，但他指出不同的习俗、性格等均与各地经济、生活发展的不平衡有密切关系；第三，他还讲到各地风俗的相互影响，如说：“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又如燕“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第四，司马迁还指出来，有“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必要，这是一个如何统一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总之，看到文化统一性中的不平衡发展，使我们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我们的传 统文化。

承传性中的老翻新

我国古代文化代代相传，即使是不同民族所建立的朝代，也是完全继承前代传统，流传中的继承性以至于使人产生错觉：中国古代文化是静止的、封闭、超稳定的。当然，谁也不会说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发展变化，其所以会产生某些错觉，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采取了“老翻新”的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些儒家经典，到汉代成为经学，以后代代相沿，一部经学历史可以一直写到近现代，尤其在封建社会里，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它的影响面很广，是影响思想文化各方面（特别是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文字学等方面）的一种学术。鸟瞰一下经学发展的轨迹：先是分成经今文和经古文两派齐头并进，后又看到汉学与宋学两派相辅而行，因为经学“枝叶蕃滋”，更可以看到众多的师说、家说和林林总总的派别，不论说两大派也好，三大派也好，或四大派也好，共同之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都是披着经学

的外衣，通过“经典”的解释、阐发和议论，发挥自己的思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时候比较着重于训诂，但并不是没有思想；有时候则着重发挥义理，当然也以训诂为基础。由训诂而义理，又由义理而考证，再一变又“托古改制”了。似乎在那里翻来覆去，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老翻新，任何一个时期的经学，也不论是重训诂或重义理，都反映着该时期某些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的思想、观念。新的思想，进步的思想，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多半这样从旧中翻新出来的。王充是新道家也是经学家，他的经学是属于经古文学派的，他却能独树一帜，从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而被称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纬书、纬学也可以说是经学中翻出来的新东西，不过它不是什么进步的新东西罢了。玄学是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新学，它与经学是显然不同的，但是玄学家以老庄之说解经，翻出了新意。何晏还与郑冲等人撰《论语集解》杂采众说，并下己意，不仅盛行于当世，而且流传至今。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谈到一个例子：“在《论语集解》‘温故而知新’章说：‘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师矣。’按此释大背孔义。……何晏此论，完全是他自己由旧通‘新’的学术路径，企图在‘师’的地位上，得出内老外儒的‘新’义。”① 王弼所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等著作中亦多己见，说他们是经学的又一个派别似也可以，尤其是这个派别大破汉儒家法，大谈义理，从老经典中翻出了许多新意。明义理就是讲微言大义，这样发展下去，谁都可以说自己得圣人之心传，我是正宗的。打着经学的招牌，发挥的是自己的思想，从旧的经学和经说中翻出来的，有时代、阶级等烙印的思想。所以，宋代也可以说是经学的时代，但和汉代那经学时代就大不一样，宋学与汉学泾渭分明。但就事论事我们很难评出高低、优劣，把它们看成随时发

① 《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第4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展的不断地旧翻新，倒可以作出种种议论。明清以至近代的启蒙思想、改良主义，从某种意义说，都是从旧的经学中翻出来的（决定的当然是时代条件的成熟），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上举例能够反映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老翻新。可否这样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主要的不是采取"推陈出新"的道路，而是采取老翻新的形式，这一点值得注意，值得进一步研讨。那么承传性中的老翻新应如何看待呢？我们说以下两点：

首先，老翻新的道路可能有其局限性，但决不能否定。它有利于保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有利于形成真正的传统。

其次，从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创新离不开传统，也不应该离开传统。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具体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剔去糟粕取其精华？社会主义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所当然有自己的特点，这特点不是与传统有关么？自己本来有路可走，何必完全学别人的走法呢？

讲到老翻新，会联想到马克思的一段话："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它曾被用成一种批判语言，完全从反面理解了，恐怕是片面的。因为在这一段话前面，马克思明确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以上描述的发展轨迹是否与发展本身的事实相符？政治文化与哲学文化发展高潮相间的提法是否恰当？不平衡性与多样性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关系如何？老翻新与推陈出新如何区别？我国没有也不需要经过“文艺复兴”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乃至于统一性这样的问题也还可以讨论，且不说抗战时期范文澜曾写过《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今天讲统一性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里只是想就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提出问题，以便进一步研讨。

第 二 章

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当是先秦时代。但先秦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时间也相当长，而一般所说的先秦，不过就只是讲到夏、商、周。可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却是在更为遥远的古代，所以，以先秦时代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事实上只是从"流"的角度来划分的，不过是长河之上游罢了。从文化发展看，先秦时代（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也可以说是发展的源头，因为中国文化的一切因子都在先秦时代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自然的、人生的、哲学的、政治的、艺术的乃至科学的，大至宇宙观、世界观，小至一些具体观念乃至格言警句，后世所有的，外国所有的，大都可以在先秦时代找到，而且许多都有比较完整的记载。所以后来乃至现在，人们所说什么什么东西（文化观念方面的）《易经》中有，《诗经》、《书经》中有，孔子言论中有，道家著作中有，这也是不错的。作为原始的素材，的确许多东西都在先秦时代有了。至于后人如何理解？如何发挥？文化传统如何形成？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先秦的各种文化因素中，消极的积极的都有，后人如何取舍？如何继承？必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才能看到。文化传统的形成，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充实的过程，源头很重要，每一个发展阶段也有自己的重要性。紧接着先秦时代的汉唐时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它对于我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很特殊的意义，那

就是全面地完成了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规模与制度大体上定下来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统一国家一脉相承的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世代努力创造的文化。这里首先有一个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的问题。

我国古代的国家观是一种天下观，先秦古籍中家、国、天下连称，意思是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夏、商、周三代统一各诸侯国称为："有天下"，如《书经．大禹谟》所说："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为天下君者即天子（《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最高统治者称天子，或称王，王统治的也是天下，春秋以后诸侯僭越称王，周天子就有了"天王"的称号。总之。先秦时期，人们已形成了四海统一的国家观念。

与此相关的是民族观念。天下之君奄有四海，四海之内是包括许多民族的，如《尔雅．释地》所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所以先秦时期虽有"蛮夷华夏"之别，但并无明显的民族界线。华夏似乎是一个中心民族，实际上也不过是在地域概念上发展起来的，可能是华山、夏水一带生活的部族（待进一步考证），这是指尧、舜、禹时期。华夏作文彩广大解当是后起之意。后经夏、商、西周，这个中心民族不断扩大。

夏、商、周可以说是不同的民族（或者说部族），但他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互通婚姻（如周文王的母亲是商族的女儿，周武王的母亲又是属于原夏族的），于是血统上的区分和隔阂就没有了，华夏族包括了所有夏、商、周族的后代。再说，当时的蛮夷戎狄，与诸夏通婚也是极普遍的事，称蛮夷戎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戎狄、蛮夷可以互用，有些被称为夷狄者与诸夏同宗同种，如楚国之自称蛮夷。所以，很难从血统、种族上分蛮夷。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